

# 领导参考

##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八年第4期 总第22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 重点推介

- 01 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已启动
- 02 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 聚焦中三角

- 07 湖北：实施三个一百亿措施，对科技型初创企业普惠性税收免除

### 改革探索

- 09 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十条建议
- 13 优化营商环境，发挥政府“撬动效应”

### 经济广角

- 14 中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落地
- 17 下行压力大 中国经济需迈过哪些坎？

### 科教文卫

- 18 哈尔滨：探索“文化+”冰城模式 叫响文博会品牌
- 20 “健康广西”建设提升壮乡群众医疗获得感

### 三农问题

- 22 中国新一轮农地改革政策加速制定土地承包期再延三十年细则将出
- 23 金融支持不足是农村电商新经济的掣肘
- 25 全国县域经济分化明显：约15%县市债务水平超警戒线

### 社会观察

- 27 中国水处理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30 “互联网+”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 综合治理

- 31 政治局集体学习“吏治” 中共披露这些“用人”新动向
- 32 保护知识产权重在惩戒制度

### 环球视野

- 34 世界亟需构建新的合作型国际秩序让世界自贸区评价标准融入中国元素
- 37 中美贸易“休战”的意义

### 学术前沿

- 33 专家热议 G20
- 30 《电子商务法》解读

### 讯息快递

求是网出版



# 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已启动

台湾 《旺报》2018年11月20日

中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气氛渐浓，中共近日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5个文件，包括海南发展与扩大开放、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有关改革开放的会议越来越频繁，相关政策的推出越来越密集。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新一轮改革开放已经启动。

新改革开放涉及经济体制与党政军系统的政治改革，中央及31省分机构改革方案全部出炉，国防和军队改革框架已经搭建，监察法已出台，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城市建设与治理体系改革正在探索成型，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的乡村发展变革方案已经出台。

金融业改革、国企改革进程加速，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正一项一项落实。开放层面，自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系统升级至更高水准、更宽领域。海南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正在完善政策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近日透露六大方面支持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FTA）升级，成为中国继中国—东协FTA、中国—智利FTA之后达成的第三个升级版高水准双边自贸协定；首届进博会刚刚落幕，中国开启了从出口大国到进口大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型。

可以看出，中国以大手笔动作回应内外的改革呼声。中国改革开放40年至此，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住房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出台的任何方案都可能让一部分人得利、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发生了逆转迹象，中国一直以来受益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改变。中国的战略选择不仅事关世界发展方向，更事关中国自身要选择怎样的一条道路。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问题也愈加凸显。民众的“获得感”近年关注重点，与“获得感”相关的利益分配问题，成为接下来改革开放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由此不难看出，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如果说当年的改革开放更需要思想解放，那么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时代智慧和落实魄力。在深改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大局”和“落实”，已可窥见未来的方向。

第一，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企改革、金融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这些要啃的硬骨头，既是内外高度关注之处，亦牵动中国经济发

展命脉。拆解、嚼碎硬骨头，正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优化进程。改革开放至此，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前所未有地提高，不仅改革效率要提高，效果亦要明显。

第二，开放应看作回归市场化的路径、感恩回馈的方式与治理自信的表现。在全球化遇到逆潮之际，中国作为崛起国应扮演建设性角色，以主动开放、协商治理思路引领新一轮更为公正、包容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年的东亚系列峰会还是 APEC 峰会，中国领导人都在释放这一信号。

这既是负责任大国的表现，亦是中国对多年受益的国际经济体制的一种回报。充分开放才有充分竞争，开放可倒逼国内产业优胜劣汰，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基础必将进一步市场化，中共的治理自信也更为彰显。

第三，平等问题要在做大共同蛋糕中解决。十九大报告定性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将分配原则从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整到“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公平”，表明中国对分配问题高度重视并正着手解决。今年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的消费升级降级并存背后的社会分层问题值得重视。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汲取了资本主义的许多优点，同时还应当继续发扬社会主义的优势，比如注重民生与公正。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成果的分配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也可说是一种信仰。近 40 年国家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不必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另一方面，政策的出台、传导到见效，不会立竿见影，中国社会及外界对此要给予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 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王小鲁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8年12月4日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经历了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改革前1977年的17.5%大幅度上升到2017年的58.5%。尤其是最近20年，城镇化进一步加速，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以上。与此同时，城市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占地面积在迅速扩大。

### 城市化中的土地资源错配

城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有效利用非农土地资源。在通常情况下，城镇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显著高于乡村，其中城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显著高于小城镇，大城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又显著高于中小城市。通常情况下，大城市人口密度更高，能够提高土地的集约度，从而有效节约土地资源。因此认为城市化必然大量占用

土地资源，大城市更加耗费土地资源的流行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城市化并不必然大量占用土地资源，只是通过人口的空间布局改变而改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状况，在合理的情况下能够节约土地资源。如果出现了过多占用土地资源的情况，必然存在土地资源的错误配置。

中国自1990年以来，城市、小城镇（县城和建制镇）和村庄人口密度都在下降。其中，村庄人口密度下降主要原因是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向城镇迁移，而城镇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则有明显不合理的因素。特别是在城市，近些年来居住区和商业区域的土地容积率都有大幅度提高，大量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替代了中低层建筑。这个因素应能够抵消居民居住条件改善和城市道路增加导致占地增加的因素而有余。因此人口密度的大幅度下降，不能归结为居民居住条件和道路设施改善，而主要反映了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主要由以下原因导致。

首先，建设用地资源目前完全由各级政府进行配置，服从于各级地方党政官员最关心的两个目标：一要有突出的政绩，二要扩大政府收入。政绩目标驱使各级官员过度追求GDP增长，往往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导致各级政府不顾条件，投入大量土地和资金竞相建设开发区、高新产业园区。目前全国仅列入国家级的新区、自贸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区就有几百个，还有更大数量属于省、市、县各级的开发区、产业园区，有些乡镇也不例外。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做大GDP，往往低价或零地价向企业出让土地。这样做无疑降低了企业的用地成本，但同时也鼓励了企业多占地、低效用地。这些开发区和产业园区经济效益好的是少数，多数没有经过充分论证，达不到预期目标，土地厂房严重闲置，浪费了宝贵的资源，拖累了长期增长。

其次，为了提高政府收入的目标，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征地卖地，抬高地价，推动房地产开发，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政府独家征地、独家卖地的现行土地制度下，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卖地收入，刺激很多三、四线城市过度推动房地产开发，导致房地产供应过量、占地过多、空置严重。不少大城市还在政府垄断地源的情况下促进了房价不断攀升，加重了普通居民的住房负担，推高了商业租金成本。同时也导致了杠杆率不断上升，金融风险越来越大。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过去一个时期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在各级政府主导配置的条件下没有实现合理有效的利用。城市土地越占越多，面积越摊越大；尽管楼房越盖越高，人口密度却越来越低。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如果上述城镇占地过度扩张的趋势不及时改变，必将对中国有限的耕地资源形成威胁。

### **农村土地需要实现合理配置**

目前不少地区的村庄因为人口大量外迁出现了村庄萧条衰败的情况。有几个原因



阻碍了村庄土地的合理利用。

其一，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转移人口的覆盖进展缓慢，很多已经举家迁徙城市并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村转移人口仍然无法在城市地区安家落户、实现市民化，不得不保留农村的住房以防万一。还有更多的迁徙者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不能携带老人、儿童随迁。

其二，因为未开放土地和房屋流转市场，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但空置的宅基地不能合法转让，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无法实现，还阻碍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新增人口要多占土地，已经外迁人口的占地又不能有效利用，导致了村庄占地扩张和土地资源浪费。按照某些部门的规定，农户宅基地的转让只允许在本村居民之间进行，实际上把主要的需求方排除在外。近年来一些城市居民到农村投资购房建房用于休闲度假，一些商家在农村投资经营“农家乐”、休闲观光农业。在不违法占用耕地的情况下，这些投资既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满足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需求，也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改善了农村面貌，有利于农村繁荣，是天大的好事。对这些积极的市场活动横加限制，只会促使农村衰败。

其三，按照某些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只有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才能转让，而“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又被某些行政部门严格限定为“乡镇企业用地”。这一限制于法无据，而且很不合理。因为乡镇企业用地只是历史形成的既成事实，与其他用途的集体建设用地之间并无法律界定的区别。有些地区乡镇企业没有发展起来，按照上述规定就意味着这些地区无权进入土地市场。有些地区过去乡镇企业较多，但分布非常零散，常常是这里三间房，那里两亩地；而且用途已经发生了很多变更；不仅界定十分困难，而且即便转让也难以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此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属集体所有，哪些部分用于经营，本来是农民集体固有的权利。因此上述限制，不仅妨碍土地市场的发育，也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中国农村的村庄占地历来不够经济，因为很多村庄都是自然形成，没有规划，农民过去习惯居住独家独院的平房，条件简陋，但占地很多。2016年全国城镇7.9亿人，建成区占地10.3万平方公里，人均130平米。农村5.9亿人，村庄占地14.6万平方公里，人均250平米。尽管近年来城镇占地越来越不经济，但乡村人均占地仍几乎等于城镇的两倍。特别是在人口大量迁出的地区，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对村庄进行整理，既可以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改变村容村貌，又能够减少占地、节约大量土地资源，让农民增加财产收入。这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通过市场流转，节约出来的土地资源才能得到有效利用，农民才能得到收入，也才会有资金和动力进行这种整治。

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逐步推进。在城市化仍在发展、建设用地资源不足的城市周边区域，闲置的土地资源有可能尽快得到利用。而在城市化波及不到的边远农村地区，闲置土地资源的利用可以参考重庆、成都等城市已经创造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建立一套市场化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制度。农民把闲置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可获得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市场有偿转让给需要进行建设的城市地区。通过这样的市场转让，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边远地区农民能够获得可观的收入，参与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利益；缺乏土地资源的城市在占补平衡条件下获得了需要的建设用地。这是一个城乡双赢、居民和商家双赢的结果，是化闲置资源为财富的结果，应当积极总结经验，进行推广，逐步实现跨省转让。涉及土地质量的差异，可以按质量等级设置折算系数，不必是简单的一亩换一亩。

### **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将释放巨大潜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村劳动者在市场引导下向城镇转移，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这是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其中大部分时期，经济保持了2-3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劳动力和资本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

但与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情况不同，由于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土地资源在重新配置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闲置浪费。在1990-2016年这26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2.4亿人，增长了20%，而市、县、镇、村占地合计从1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5万平方公里，增加了10万平方公里，增幅为64%。这说明当前土地资源严重配置不合理。城市发展一方面受到土地资源有限的制约，另一方面无效占地太多，土地资源大量浪费，城市化提高土地集约度的功能正在丧失。

中国城镇化还在发展过程中，2017年城镇化率为58.5%，而发达国家普遍在70%-80%之间，高者达到90%。如果未来20年城镇化率再提高20个百分点，如果一个时期以来这种城镇占地迅速扩张的趋势不改变，加上基础设施和厂矿、水利设施等建设用地的增加，估计将再多占10万平方公里土地，意味着耕地再减少1.5亿亩，突破耕地保护红线是必然的。

目前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城镇村庄及工矿已占地32万平方公里；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占地7万平方公里；耕地按新统计口径不到135万平方公里；山林、草场占地472万平方公里，未利用土地加水面约占276万平方公里。山林、草场主要分布在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未利用土地基本上是荒漠和高山，都难以被城镇化利用；未来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只能占用已经为数有限的耕地。

中国地少人多，全国人口人均不到1.5亩耕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见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按照旧统计口径，1996年全国耕地130万平方公里（19.5

亿亩），2006年下降到122万平方公里（18.3亿亩）。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和工矿企业、基础设施占地不断增加，占用了大量耕地。从粮食安全角度出发，中国需要保护现有耕地数量基本不再减少。此基础上，政府制定了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

但自2011年起，耕地统计数调整为135万平方公里（20.3亿亩）。这并不意味着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仅仅是统计的变化，耕地还在继续减少，只是统计显示下降速度趋缓。不过考虑到全国各地瞒报占地、未批先建等违法占地的情况层出不穷，统计显示的耕地减少趋缓现象可能不真实或要打很大的折扣。如果按原来的统计口径计算，目前的耕地面积非常可能已经低于18亿亩。

当前，土地改革进展仍然缓慢，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国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但这项改革在近几年没有显著进展，始终停留在少数地区试点的阶段。最近有十几个城市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房出租，是个积极的突破。但还没有变成全国性的政策。未来的改革应该如何推进？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考虑。

第一，稳步开放土地市场，改变政府独家征地独家卖地的模式。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允许农民闲置宅基地使用权通过市场转让，在符合土地管理和规划的前提下实现市场配置土地资源。

第二，必须建设规范的土地交易市场，保证交易合法合规，公开透明，杜绝欺诈作弊，杜绝政府任意干预，特别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三，建设跨省的土地指标交易平台，允许和鼓励农民在充分自愿原则下进行村庄整治，对闲置非农业用地进行符合质量要求的复垦，并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入场进行交易。政府可以帮助农民组织村庄整治，但不得违背农民自愿原则，严禁侵犯农民利益。政府要推动交易平台的建设，但应委托中立的第三方管理；交易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防止对交易进行行政干预。

第四，完善土地增值税制度，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地价基准，对土地交易中超过基准大幅度溢价的土地征收适当幅度的土地增值税，以部分弥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但主要应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重点保证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新城镇居民安家落户、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享受公共服务。

第五，城市建设规划的制定要建立合理程序，经过多方专业评估和社会公众评价，杜绝长官个人说了算的现象，以保证规划的经济合理性，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需要推进政府改革，改变政府激励机制，实现从GDP为中心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土地市场的开放将能够释放巨大的经济潜能。首先，土地供应多元化有利于缓解城市土地短缺，抑制地价上涨，加速城市化发展。第二，农村闲置的非耕地进入市场，有利于土地资源有效利用，促进观光农业的发展，促进休闲度假村、特色小镇发展，促进乡村繁荣，增加农民收入。第三，通过村庄整治使农村的多余非耕地通过复



垦和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实现土地占补平衡，对于节约土地资源、保护耕地，将有重大的意义。

目前全国村庄占地14.6万平方公里。如果假定未来通过村庄整理能够逐步使村庄占地减少三分之一，并进行土地复垦和指标转让，应当能够节省约5万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加上纠正城市建设的资源错配和提高今后城市建设的集约度，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未来二十年城市化的土地需求而不必占用更多耕地。这5万平方公里土地假定按每平方米200元来计算转让价格，可以创造10万亿元的土地收益。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将对促进农村繁荣、缩小城乡差别做出巨大贡献。

城市化并不意味着一定占用大量的耕地，也并不意味着农村必然凋敝。推进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土地资源，避免耕地减少，创造巨大财富，促进乡村繁荣，还将有力支持未来城市化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

## 聚集中三角

### 湖北：实施三个一百亿措施 对科技型初创企业普惠性税收免除

香港 凤凰网2018年11月29日

“湖北是近代工业的摇篮，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有货到汉口活的美誉。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成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的千斤顶、繁荣市场的支撑力量、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社会责任的积极践行者。”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日前介绍了湖北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

#### 真正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作为自己人

湖北民营经济创造了50%以上的GDP、60%左右的税收、70%以上规上企业研发投入、80%以上新增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

“我曾在金融系统工作几十年，与企业家也打了几十年交道，对这个群体怀有特殊的感情。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打拚，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干常人干不了的活，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艰辛，他们身上那种天然的市场敏感性、执着的创新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蒋超良说。但当前，湖北民营企业遇到不少困难。蒋超良表示，湖北省委省政府将从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转化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真正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作为自己人，做到在认识上同样重视、政策上同等对待、工作上同步推进，将

民营企业的难点、痛点、堵点作为我们工作的切入点，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不遗余力推进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 **实施“三个100亿”措施**

蒋超良说，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着“三山”“三门”“三荒”等问题，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市场准入门槛高如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企业面临用工荒、用钱荒、用地荒；还有两高一低即成本高、税费高、利润低。

为此，近些年湖北出台了《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日前，湖北出台了《关于大力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财税、金融、社保、交通、土地等方面，推出了27条政策举措。

在全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方面，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采取股债并举、成立救助基金等办法，以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式驰援民营企业。比如实施“三个100亿”措施，设立100亿元县域发展引导基金、100亿元上市公司纾困基金、100亿元担保再担保资金等。

在全力帮助企业降本减负方面，要对中央明确的减税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企业，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费率政策。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明显降低用地和物流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在全力加大政策落实力度方面，要解决好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切实增强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的获得感。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执行同样标准去产能、去杠杆，绝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对民营企业断贷抽贷，安监、环保等领域执法和执行过程中避免简单化，杜绝一刀切、一关了之、一律不批。

此外，要全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

“省纪委监委出台了服务保障企业发展的‘12条’，督促职能部门做好涉企服务，规范审慎查办涉企案件，把服务和保障企业发展贯穿纪检监察工作和执纪执法的全过程、各方面。”蒋超良说。

### **民营企业既要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更要重视和支持企业党建工作**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志，来之不易，需要大家共同呵护。对于湖北如何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蒋超良表示，对于党政干部而言，要“清”上加“亲”，把企业家当成自家人，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家

事，及时回应民营企业家的正当要求，积极作为、靠前服务，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关心民营企业，做到有工作交往但没有利益交结，有正常交流但没有权钱交易。对于企业家而言，要“亲”上加“清”，既要积极主动地同各级党委政府沟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谏诤言；也要洁身自好，不走旁门左道，不搞歪门邪道，光明正大搞经营，遵纪守法办企业。

“我们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做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标杆。明晰和坚定企业发展战略，聚焦主业、坚守实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打造‘百年老店’。自觉遵纪守法搞经营、谋发展，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力。”

蒋超良说，民营企业既要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更要重视和支持企业党建工作，让企业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全面落实推动企业健康发展。同时，要以家国情怀报效国家、回报桑梓，积极投身精准扶贫、生态环保、光彩事业、公益慈善事业，参与融入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点工作，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改革探索

### 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十条建议

彭森 香港中评网2018年11月30日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等高端改革智库，共同开展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研究。该研究系统回顾改革进展，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关于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十条政策建议。

第一，以深化重要领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与结构优化。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重要领域、关键行业和垄断环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合资、合作、并购、参股、入股等方式，积极引入优势互补并能提供战略支持的非国有资本，确保投资者的法定权利和合理权益。

将“竞争中性”原则应用于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全面纳入竞争政策体系之中。按照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要求，以“僵尸企业”出清为突破口，采取破产重组、兼并收购、债转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有效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有进有退加速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调整。对于煤炭、钢铁、建材、原材料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的“僵尸企

业”，要加快调整退出。对于商业、物流、服务业、外贸、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除极少数已经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企业外，原则上逐步退出。

放开民间投资市场准入，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竞争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加快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第二，以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服务均衡配置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明晰土地产权，加强对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收益分配权的的确权和保护。为农民宅基地增权赋能，逐步确立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将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等列入农民集体或个人财产保障体系。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前提条件，农民进城退地与否由农民自主选择。改革土地征用制度，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无论是公益性用地还是商业性用地，征地价格由市场决定，政府维护交易规则与过程的公平及土地收入的调节。抓紧《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工作。

以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为基础，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基础设施网络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机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以价格体制和盈利模式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深入推进价格改革，打好重要商品价格改革攻坚战。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棉花、大豆等目标价格政策，以试点示范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根据交通运输市场各领域、各环节供求关系和竞争格局变化，建立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政府由直接核定价格水平转向规范市场主体定价行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建立健全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全面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深化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加快推进跨省跨区输配电价和省内电网、新增配电网价格、新能源发电价格改革，完善输配电价格监管规则。有序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

深化网络类自然垄断领域改革，彻底将其竞争性业务与自然垄断环节业务分开，将前者推向市场，开放竞争。兼顾技术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在网络一体化基础上着力推进产权多元化和规模适度化。修订完善《反垄断法》，加强对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依法制止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主体滥用垄断地位。以“必要成本+合理利润”的价格形成方式稳定投资及市场预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各类网络投资建设。市



场经济的基础性政策是竞争政策，而保证竞争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进一步从政治上提高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权威和效能，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政策有效落地实施，防止新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第四，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服务实体经济为重点，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推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投资者及融资中介的多元化。继续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体制和再融资体制及退市制度改革。健全新三板市场投资准入机制，加快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基础产权市场发展。健全资本市场监管体系，防范各类融资风险和市场剧烈震荡。

创新直接融资模式和机制，缓解企业过高杠杆或融资“瓶颈”。以改革政府投资方式为重点，大力发展民间股权投资和社会风投基金，分散、防控各类投资风险，财政预算资金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整合企业债和公司债发行市场与监管机制，提高债券市场融资能力。

第五，以优化政府机构层级和企业营商环境为切入点，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调整政府部门与层级，全面深化大部门制改革，保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独立与权力制约。推进政府层级改革，最终形成中央、省(区、市)、县(市)三级政府基本架构，推动政府职能根本性转变。

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推广完善企业法人承诺制，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

着力破除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的行政管制，使各类资本能够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服务行业和领域。加快完善服务业市场决定价格机制，放开服务业竞争性领域和环节的价格。推动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要素使用政策平等一致，争取到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实现体制内外的服务业主体在人才待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平等，消除各类歧视性规定。

第六，以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重点，打造普惠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按照“一体两翼”的路径，推动财政、预算和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以结构优化、节能环保、绿色健康、代际公平为制度取向，完善税制体系，确立理性税率。推进增值税适应性延伸和技术性完善，以国民待遇形式规范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加快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以综合为主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居民收入调查统计和交叉稽核等税收基础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建立起税制健全、税率合理和税负公平的现代税收体系。通过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基本财政层级架构，完善分税比例，建立事权与支出



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建议在宪法中明确事权划分原则，以法律的权威性保证事权划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推进财税重要领域改革，健全普惠民生、平衡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加快分离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基金性质分账分级管理。其中基础养老金改费为税、以中央税形式全国统一征收。建立以人为本、以消费为基础、以人的城镇化为取向的税收增长机制与征管体制。通过市场决定作用和财税调节作用促进地区间财力均衡分布和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

第七，以金融深化和国际化发展为改革取向，有效防范区域性、系统性及输入性金融风险。

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设立更多民营银行等多元金融主体，放宽外资银行进入条件。打破区域及行业分割壁垒，构建金融科技公共基础设施。探索把人民币投融资作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装备、技术、标准、服务合作的前置条件。完善“走出去”和“引进来”投资机制，引入优质的外部投资者，合理布局全球投资重点。

依托“一委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新模式，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化金融监管治理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区域性、输入性风险，构建与当前金融业态创新相适应、有利于防范风险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第八，以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推动民生社会体制改革。以放宽市场准入为重点，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将医疗、教育事业向社会开放，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引导、扶持社会力量生产公共产品及其他具有公益属性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民生社会事业以人为本，民办民享。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民生社会体制改革。将基本养老保险划归中央事权，加快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力保障机制。

以公益性托底功能为出发点，推动公办事业机构改革。

第九，以空气、水体、土壤等环境治理为出发点，推进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尽快建成覆盖全、范围广的水体、空气、土壤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数据支撑，形成生态资产清单，推进环境污染治理。

加快建立主体权利义务均衡、产权边界清晰、权能完整有效、利益分配公平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推行排污权、碳排放权、节能量等交易，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强化生态职责和监督问责，建立环境治理协调机制，强化对重点领域和区域资金分配使用的监督检查。健全绩效考核、评估和激励机制。构建公开公正的生态补偿程序，引导各类受益主体履行生态补偿义务，督促管理者切实履行生态治理责任。

第十，以投资贸易便利化和经济全球化为指向，创造内外部经济平衡发展的体制环境。适应国家经济地位和国际市场关系的重大变化，主动调整投资、贸易政策和对外开放战略，保障国家全球经济战略利益。从资本输入国思维转向资本输出国思维，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积极应对逆全球化浪潮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严格依法保护产权，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加快推进金融业、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

创新经济外交政策，通过双边、多边关系及国际秩序、规约的建立和完善，重点加强、巩固与我有重大利益关切的国家和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贸易投资及合作关系，尽可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 优化营商环境，发挥政府“撬动效应”

香港 中评网 2018年12月2日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排名比上年度跃升32名，同时成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唯一进入2019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十大最佳改革者名单的经济体。榜单中，中国进步最大的一级指标包括“获得电力”“开办企业”“保护少数投资者”，分别提升84名、65名和55名。亮眼的成绩充分说明，中国在全面提升营商环境上成效显著。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企中心副主任张楠迪扬文章表示，不久前，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三个没有变”。如今，全国范围都在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地方的探索可以概括为“五个驱动”。

首先是以部门政策为驱动，即基于世行的指标体系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引导。世行指标被视为全球营商环境的风向标，政府部门主动对标世行评价体系，优化既有政策，出台新政策，在推动实际改革的同时，增进与世行团队的沟通，加深了评价团队对中国改革的理解。

其次是以机构与制度改革为驱动。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

化机构改革。审改1.0版本是推动成立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式”审批；2.0版本是试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部门审批职能整建制集中到新设的行政审批部门，实现“一颗红章管审批”。成都武侯区、宁夏银川市、江苏盱眙县、天津滨海新区，分别是我国区、市、县，以及开发区改革试点的代表。

再次是以技术赋能为驱动。数字治理时代，“互联网+政务服务”为政府赋能。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在全国范围推行改革。各地也先后提出相应改革目标，比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江苏的“不见面审批”、福建的“马上就办”等，并同时出台系列配套政策。

还有是以统一的、符合国情的评估体系为驱动。世行的评价体系是促进我国提升营商环境的契机，也是向国际展现中国改革成果的窗口。但世行指标中缺乏中国元素。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一套新的指标体系，在世行指标基础上增加11个指标，以更贴合中国实际。目前已经采用该指标体系完成对部分城市试评价，未来将形成中国特有的评价体系。

最后是以构建“整体型政府”为驱动。优化营商环境不能各部门“闭门造车”，打破“九龙治水”的碎片式治理结构是关键。目前各领域的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汇集联动趋势，“整体型政府”正在形成。比如，在全国范围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以及综合监管、综合执法体制，实现“大联动、大联勤”等。

文章提出，在此基础上，突破改革“深水区”，还需在以下几个方向深耕。第一，新技术的应用可引向深入。比如电子信息技术加快了数据在各领域的沉淀，有针对性地开发和利用是下一步的重点。第二，将机构与政府职能改革推向深入。第三，将政策执行落到实处。优化营商环境的第一步是制定政策，但关键还在执行效果。

在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中，世行的评价标准发挥了“鲇鱼效应”，也敦促中国制定符合国情的自我评价体系。同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行政力量的撬动效应也非常关键。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举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 经济广角

### 中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落地

易宪容 香港《凤凰周刊》2018年11月22日

中国央行、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27日联合发布《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明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范围，规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流程和总体方法，合理认定对金融体系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

融机构。

### **金融委认定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均需接受监管**

综合上海澎湃新闻，中国央行官网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规模较大、结构和业务复杂、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在金融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将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中国央行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从中国情况看，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部分规模较大、复杂度较高的金融机构因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度高而居于金融体系核心，对中国金融体系整体稳健性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为此，迫切需要明确政策导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制度性安排，补齐监管短板，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指导意见》明确，包括商业银行、开发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在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机构，以及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认定的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都涵盖其中。

换句话说，不仅是中国国有五大行等商业银行、券商、保险公司，正在进行试点的如蚂蚁金服等金控集团，也可能被纳入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名单。

由于《指导意见》属于一个宏观政策框架，更多的监管要求和操作细节还要等实施细则出台才能明确。其中，而市场最为关注的中国的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名单，需要由金融委确定后，由央行和相关监管部门联合发布。

首先，中国央行会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划定参评机构范围，确定评估指标。其中，对参评机构范围规定了资产占比和机构数量两套可选标准；一级评估指标包括机构规模、关联度、复杂性、可替代性、资产变现等。在评估过程中，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负责制作数据模板，进行数据收集，计算参评机构系统重要性得分，向金融委办公室报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初始名单。

随后，中国央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可根据其他定量或定性辅助信息，提出将系统重要性得分低于阈值的金融机构加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的监管判断建议，与初始名单一并提交金融委办公室。

### **究竟有多少数量的机构会被纳入大而不能倒的名单？**

央行此前在2018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表示，最终评估出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应符合实际情况，一方面避免遗漏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重大威胁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避免过度扩大名单范围，造成金融机构监管负担过重。

同时，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名单和认定并非一成不变，中国金融委每三年对上述评估流程和方法进行审议并进行必要调整与完善。

与国际标准一样，一旦被纳入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将需要面对更为严格的监管。



中国央行表示，将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附加资本要求和杠杆率要求，报金融委审议通过后施行。其中，附加资本采用连续法计算，使得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附加资本要求与其自身的系统重要性程度相适应。根据行业发展特点，人民银行还可会同相关部门视情对高分组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等其他附加监管要求。除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制定特别监管要求，《指导意见》还通过另一个途径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即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处置机制，推动恢复和处置计划的制定，开展可处置性评估，确保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发生重大风险时，能够得到安全、快速、有效处置，保障其关键业务和服务不中断，同时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

央行称，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各项要求，积极推动相关实施细则尽快出台。被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当按照《指导意见》及相关实施细则的规定，依法合规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 **《指导意见》从哪些方面完善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制度？**

《指导意见》主要涵盖三个环节：一是科学评估，合理认定对金融体系稳健性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二是加强监管，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发生重大风险的可能性。三是建立特别处置机制，确保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发生重大风险时，能够得到安全、快速、有效处置，保障其关键业务和服务不中断。

### **相关部门在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方面如何分工协作？**

《指导意见》指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由金融委在中国央行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中国央行负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基本规则制定、监测分析、并表监管，视情责成有关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监管措施，并在必要时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对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负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的数据收集、得分计算和名单报送，依法实施微观审慎监管。中国央行会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及财政部等其他相关机构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处置机制。金融委成员单位之间要切实加强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和监管合作。

相关部门应按照《指导意见》规定的分工，切实履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责任。因相关部门未履行监督管理责任、或履行监督管理责任不到位而造成重大金融风险，金融委办公室按程序牵头启动监管问责。

### **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了哪些特别监管要求？**

《指导意见》指出，中国央行会同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附加资本要求和杠杆率要求，报金融委审议通过后施行。其中，附加资本采用连续法计算，使得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附加资本要求与其自身的系统重要性程度相适应。根据行业发展特点，中国央行还可会同相关部门视情对高分组别系统重要性金融



机构提出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等其他附加监管要求。此外，《指导意见》着力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从风险管理和信息系统等方面加强监管，以促其形成合理承担风险、避免盲目扩张的理性企业文化。

### **意见出台将会对中国金融业发展和金融市场运行构成什么影响？**

在《指导意见》制定过程中，中国央行会同相关部门对《指导意见》政策影响进行了审慎评估。

总体而言，《指导意见》的出台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内在要求，符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有助于填补监管空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指导意见》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方法进行了合理界定，影响的金融机构数量较为有限。虽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当满足更为严格的资本、杠杆率等监管要求，因此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但从这些机构在金融体系所处地位来看，理应受到与其系统重要性程度相一致的监管。同时，中国央行会同相关机构在制定实施细则时将考虑中国金融机构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监管要求与过渡期安排，避免短期内对金融机构造成冲击。长远看，《指导意见》有助于督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形成合理承担风险、避免盲目扩张的理性企业文化，有利于金融业健康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 **下行压力大 中国经济需迈过哪些坎？**

美国《侨报》2018年12月14日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自然与当前国际大背景有关。比如，全球经济普遍放缓，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等，都从某种程度上拖累了中国经济。不过，中国也必须认清自身当前面临的问题，如此才能为未来发展找准出路，并应对各种挑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拉动了城市建设、城市消费。工业化的发展，帮助中国引进了外资和技术，也完善了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制造”迅速走向世界，中国收入水平快速提高。

从目前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遇到了瓶颈，突出表现在两者对中国经济拉动力不足。城市化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中国城市房地产过度扩张，在破坏中国经济良性平衡之时，也压制了中国民众在其他领域的消费。其次，中国一二线城市控制人口规模政策，造成了很多流动人口无法获得落户、就业、育儿等方面的保障，这同样压制了城市经济的消费活力。再次，三四线收入低，机会少，产业不健全不发达，很难吸引外来人口，很多地方甚至还面临着人口流失的压力。最后，近年中国提

出“房住不炒”后，中国房地产业进入寒冬，也直接影响到了其上下游行业链条发展。

工业化方面，中国面临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挑战。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传统产能过剩，人工土地成本上升，工业化陷入了困局。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不振，产品竞争力不足，企业经营压力普遍较大。虽然，中国近年也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求高质量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

民企企业在中国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据统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量中的60%、新增就业中的90%以及财政收入中的一半以上由民企贡献。但近年，中国民企的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今年，中国一度传出了“民营经济退场论”的声音，一度引发了民营资本的恐慌。事实也是，当前民企就面临着融资难、发展难等困难。近年，中国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不少民企从事的却是传统低端产能供给，缺资金乏技术下，它们中的很多不得不走向没落。

## 科教文卫

### 哈尔滨：探索“文化+”冰城模式 叫响文博会品牌

付彦华 张晓磊 香港商报网 2018年12月11日

首届东北亚文化艺术博览会近日在哈尔滨落下帷幕。然而曲终人未散，被誉为东亚文化之都的哈尔滨再次站在文化产业的“风口”。哈尔滨文化产业的巨轮如何顺势而为、创新发展？为这座城市留下一个新课题与深深思索。

首届文博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推动本土文化“走出去”，为冰城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助力，诠释了品质高、专业强、参与度高的展会定位。哈尔滨市文明办副主任于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于丽称，通过此次文博会，让深圳文创企业对哈尔滨的营商环境、历史文化底蕴有了更深层的了解，感受到了哈尔滨市民对于文博会的喜爱程度，哈深合作取得了多项成果。这对于哈尔滨的经济文化产业发展和前沿城市的合作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我们在原有的冰雪、音乐、黑土等文化的基础上，又学到了深圳的创新文化，为冰城文化产业发展提速。

#### 用文创产品讲好冰城故事

“哈尔滨是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城市，基于这些多元文化元素的基础，要积极打造‘文化+科技’、‘文化+创意’、‘文化+旅游’、‘文化+工业’的冰城模式，探索文化发展新路径，用文创产品讲好冰城故事，用文创产品留住‘人’和‘心’。”于丽强调，文化是城市发展之魂，哈尔滨在城市发展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大，有着

很鲜明的外来文化特色，例如犹太文化、俄侨文化。同时，哈尔滨作为老工业城市，工业文化也是哈尔滨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文化建设上就要区别于其他城市，要留住这些文化之根，不只做表面的、风光的、自然的，要做走心的、内在的、人文的。让游客到哈尔滨来，不仅仅是看风景，要通过具有差异性的文化元素，来展示独属于哈尔滨的城市特色，让他们看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让他们融入冰城文化的氛围之中，这样才能让游客对冰城印象深刻并植根于心，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的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

### **打造艺术的节 建设开放的城市**

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不仅取决于存量，还取决于增量，而解决文化增量的关键就是改革创新。于丽表示，当前，哈尔滨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哈尔滨文化事业及产业的发展，可以在文化艺术的节会上做文章，例如丽江、乌镇等旅游城市的文化艺术节做得就很好，它们并不是做简单的展示，而是融入了诸多本土特色文化元素，这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在此基础上，哈尔滨的文化事业建设也要大胆尝试，敢于创新。既然有哈尔滨之夏，那也可以做哈尔滨之冬，整合文化元素，打造“文化地标”。再通过此类节会，打造演艺集群、文化产业集群，让文化产业也能成为哈尔滨的支柱性产业。

文博会的“老班底”——牡丹江渤海靺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艳玲称，“通过博览会不仅能看到各个省份的优质文化衍生品和社会焦点的文创产品，更看到了南北文化的差异，北方更注重传统文化，南方致力于创新文化。这对于文化企业来说是好事，能够让企业快速融入深圳的设计理念，以此来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开发出有品位、有档次的文创产品。同时又能把传统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老记忆，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孙艳玲称，作为文化企业期望政府搭台，多举办文化产业洽谈会，让更多的深圳设计师和创意家分享他们的成功案例，为黑龙江的文化企业注入新鲜血液。让真正的富有龙江文化特色的产业及产品、具有龙江地域特征的手工业，能够真正地对接深圳的设计界和艺术界的大咖。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研究员王为理先生就哈深未来文化产业如何发展提纲挈领。一个文化产业要发展的好的话，首先它的目标应该是追求高质量而不是简单的、传统的这种低附加值的这种制造业，哈深都要放眼全球，做好顶层设计。其次，文化产业要真正发展起来的话，关键还是要靠市场。深圳产业之所以从无到有这么多年来在国内能够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一些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就是跟这个市场化因素有关系。

### **把文博会打造成冰城文化名片**

文博会，是文化改革创新的平台、文化梦想实现的舞台。于丽称，一个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要相互促进，在融合在进步。此次深哈合作就是对彼此文化发展的有力推动，作为对俄中心城市，哈尔滨是深圳对接俄罗斯及东北亚的桥梁和纽带。对于哈尔滨而言，更能进一步打开对俄文化合作交流的窗口，助力冰城打造东北亚中心城市。

于丽最后强调，文化是柔软的，也是有力量的，文化是最吸引人的，所以要用文化去留住人，去引领人。文化的作用不可小视，要把哈尔滨的魂和内涵充分的展示出来，进一步办好文博会，让“东北亚文化艺术博览会”为哈尔滨代言，能够真正成为一张让哈尔滨文化“走出去”，又能把创新文化“引进来”的软实力名片

## “健康广西”建设提升壮乡群众医疗获得感

唐荣桂 台湾《电子时报》2018年11月30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健康广西”建设，医疗卫生事业进步显著，健康扶贫和医改持续推进，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百姓医疗获得感持续增强。

### 医疗条件大变样 百姓健康水平显着提升

全州县龙水镇中心卫生院位于城镇中心，绿树成荫的小院闹中取静，不断有患者进进出出。龙水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蒋青松1994年到卫生院工作，见证了卫生院翻天覆地的变化。“近3年卫生院投入450万元建设基础设施、采购医疗设备，门诊大楼和职工周转房马上建成。”蒋青松说，卫生院人员由2012年的30多人增加到48人，医疗力量得到充实。

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镇马伦村的医疗条件也发生了巨变。马伦村村医马乃茂说：“过去村民看病往往到村医家里，医疗条件简陋，主要是听诊器、体温计和血压表‘老三样’。现在村卫生室配置了微波治疗仪、电针治疗仪等设备。”

60年来，广西城乡医疗卫生体系日益健全，实现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医疗机构数、病床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由1978年的0.49万家、4.88万张和5.58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3.4万家、24.12万张和30.54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自治区各级财政投入卫生计生的专项资金达1100.68亿元，年均增长15.15%。

自治区卫健委数据显示，广西人均预期寿命由1963年的60岁提高到2017年的77.03岁。

### 健康扶贫惠民众 家庭医生进农家



容县杨梅镇红石村80岁的贫困户李伯华前不久因突发脑梗塞，在杨梅镇中心卫生院住院，8天总费用3871.71元。得益于贫困户“先诊疗后付费”政策，李伯华入院不用交押金，出院时通过“一站式”结算平台结算，个人只需支付317.25元，报销比例达91.8%。

疾病是贫困人口脱贫路上的“拦路虎”之一，广西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返贫的曾一度占30.9%。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广西2017年开始实施健康扶贫攻坚行动计划，提出农村贫困人口医保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给予60%以上补助、参保贫困人口在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等措施。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贫困人口在家门口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重要举措。灌阳县文市镇王道村村医王庆练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家庭医生，他平时除了为村民看病，还要为村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定期上门为100多个慢性病患者提供量血压等服务，督促患者按时吃药，注意饮食。

南宁市卫计委介绍，南宁今年投入473万元组织乡村医生分批次开展为期3个月的脱产培训，同时依托县级和乡镇医疗机构对乡村医生进行岗位培训，确保乡村医生每年接受免费培训不少于2次，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2周。

为充实基层医疗力量，2012年以来，广西共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4000多名，其中第一批245名毕业生今年已回到定向服务地。

经过努力，2016年至2017年，全自治区累计有39.16万贫困患者得到诊疗服务，贫困人口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86.68%，因病致贫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减少约22.9万户，占贫困户比重降至约18%，因病致贫返贫情况得到有效缓解。

### **医改深入推进 构筑群众健康守护屏障**

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处桂北山区，县医院医疗水平相对有限。去年6月，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携手龙胜县医院共建医联体，龙胜县医院成为南溪山医院龙胜分院，南溪山医院选派8名业务骨干，长期担任县医院的常务副院长和7个科室的执行主任。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了县医院的综合服务水平，山区老百姓就近享受到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自治区卫健委介绍，广西已初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构建起县域医共体、三医联体、城市医疗集团、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等类型医联体，努力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

作为国家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灌阳县去年初组建了广西首个县域公立医院集团，实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打通县域内医疗资源流动“肠梗阻”。“3家县级医院和9个乡镇卫生院的人财物全部纳入医院集团管理，县乡村医疗机构被打通。”灌阳县公立医院集团院长熊国军说，医院集团将管理和资源下沉，选派县级医



院骨干到乡镇分院挂任业务副院长，安排县级医院科室“一对一包点”，提升乡镇分院的医疗水平。

与此同时，广西深化药品供应保障制度改革，在14个设区市公立医疗机构实施药品集中采购“两票制”，解决药品流通环节过多问题，降低虚高的药价。改革后，灌阳县公立医院对所有药品全部实行“两票制”，13种耗材实行“一票制”，基药与非基药价格分别下降5%和15%，耗材价格下降10%至30%。

## 三农问题

### 中国新一轮农地改革政策加速制定 土地承包期再延三十年细则将出

美国《侨报》2018年11月28日

近日从有关部委及权威人士处获悉，包括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在内的“三块地”改革试点即将收官，近期还将重点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照计划，土地确权登记及“三块地”改革试点均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接下来将进入农村土地改革三项试点总结评估期，在此基础上加快土地管理法修改。

此外，新一轮农地改革政策正在加紧制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政策制定工作已启动，不久后将出台。还将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身份确认，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红利将加快释放。

土地承包期再延长近年来尤为受到关注。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此前报道，在2017年10月31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审议。

对于承包期，草案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为了给予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预期，草案规定，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表示，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已开展了两轮承包。第一轮从1978年开始，承包期十五年，最早的1993年到期。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到2023年到期，不过个别地区由于晚几年才开始承包，会晚几年才到期。第三轮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会到2053年到期。

之所以第三轮土地承包期仍然选择三十年而非五十年、七十年或者更久，宋洪远分析称，在总结第二轮土地承包实践的经验中提出的三十年承包期，虽然不长但也不短，对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这一目的来说已经基本达到了。而且制度是为发展目标服务

的，是为了满足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而安排的。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施行。随着这十多年的发展，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出现了农民在土地承包实践，以及学界关于土地承包理论中的创新。比如，土地承包关系中的“三权分置”。

2014年9月，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在修法层面上，2015年，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就被列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而草案也顺理成章吸纳了“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中分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

关于承包地确权登记，201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至2017年底，31个省（区、市）均开展了承包地确权工作。今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对承包地确权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底，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等17个省份基本完成。此外，青海省也于近日宣布，基本完成全省土地确权任务，确权率达到98.58%。

此外，据悉，“三块地”改革于2015年2月底正式启动，限定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2017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决定，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期限延长一年至2018年12月31日。

## 金融支持不足是农村电商新经济的掣肘

香港 中评网 2018年12月7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农村电商则是输血式扶贫、造血式脱贫之后的致富新途径，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

经济参考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伍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曲一鸣文章表示，早在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指出要“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向农村延展业务”。在政策推动下，农村电商分享到了中国电商成熟发展形态的红利，借助农村地区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的巨大供需市场，开始在农村大地落地生根、惠泽万民。然而，

随着在各地试点的结束，随着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铺陈，农村电商的发展遭遇了瓶颈。除了农村地区传统的落后因素，金融支持不足成了农村电商持续发展的最大掣肘。这种支持的乏力既体现在金融的硬件设施条件，也体现在各金融机构主体的创新能力、思想观念等软件条件上。

一是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落后，对农村电商的金融服务缺位。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遗留等因素，普遍存在着农业基础设施、物流配送网络及金融配套服务发展较慢的问题。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最突出问题就是农村金融网点数量少且未能实现深入下沉。很多金融机构多将网点开设在县乡一级，未能深入下沉到村镇一级；部分涉农金融机构因为扁平化管理的需要，在农村的网点不增反减；部分县域商业银行还存在着自主权少、授信额度小等问题。这种金融服务缺位的现象，令许多深处偏远地区的农民群众难以享受到普惠金融的便利，如存款提现、以整换零、小额贷款、小额理财等。服务缺位、设施缺乏的另一表现就是征信系统和风险机制的不完善。虽然金融机构的内部信用机制较为完善，但实现各机构的互通共享则有一定困难，机构间各自手握一小部分信用数据，覆盖面较窄。特别是农村地区征信系统还处于起步阶段，使得金融机构难以获取农村贷款客户完整的信用信息。加之农村金融中介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建立，政策性担保公司数量严重不足，致使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亟待完善。

二是农村金融产品单一，支持农村电商的创新能力不足。目前，银行贷款仍然是农村电商乃至整个农村市场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可以说，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经络细胞，但在实际服务和支持上仍存在不少困境。首先，针对农村电商开发的金融产品较少，即便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电商融资仍然主要依赖传统类型的贷款，尚未开发电商类金融产品，不能有针对性地为农村电商汇聚资金。其次，由于农村电商在贷款时的抵押担保方式单一，不少金融机构又未将电子商务企业交易额、订单量、电商等级评分和信誉度等反映电商发展和信用的关键性变量纳入授信考核范围。“资产为先，信用在后”的观念占据主导，金融机构拥有资金实力，电商农户也不缺信用水平，但二者却不能有效结合，缺少信用“搭桥”。最后，针对农村电商还缺少较为简化的贷款流程，烦琐的贷款过程包括了客户调查、审批等诸多环节，漫长的等待时间也可能贻误商机，不能及时为农村电商企业提供资金，阻碍其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

三是农村金融供需信息不畅，对农村电商需求认识模糊。从思维认识层面看，不少金融机构没有认清农村电商市场前景，没有全面认识对农村电商企业的多种金融需求，还低估了农村电商市场未来增长空间、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与电商产业巨头相比，农村电商普遍经营规模小、资金实力弱，且更多的企业还没有走上经营正轨，物流运输、产品质检、售后服务等多方面还需要正规化。金融机构和农村电商之间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就导致了金融机构对于农村电商业务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服务理念，对新产业新机遇未能及时

更新认识、转变态度，对于基础设施完善、产品服务创新等需求缺乏重视。电商与金融犹如“两张皮”，没能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导致了资源投入与资源需求不配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电商的进一步发展。

四是农村金融科技普及受限，对农村电商的支持动力疲弱。电商的发展离不开新技术力量的支持和推动，而在农村地区互联网络、智能手机等设备普及率还不高，网络购物消费尚未形成习惯；农村金融专业人才缺乏、金融宣传工作力度弱，使得农村电商从业者对移动支付、互联网信贷等金融科技产品持不信任态度；同时，尚待完善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又使农村客户在接受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存在后顾之忧。这些都导致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推广阻力较大。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企业自身也存在对农村电商动力疲弱的问题。由于农村地区金融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客户失信惩戒机制威慑力弱，金融消费违约案件频发却难以追责，金融科技企业对全面扩展农村市场也心存顾虑。且金融科技企业多为新兴的成长型企业，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却未能在农村电商市场探索出一种较为明确的盈利模式，这也令人怀疑当前各大电商巨头“跑马圈地”是否只是短暂的火热，欠缺长久的支持动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不解决这些机制问题，农村电商所带来的市场营养也就难以全面吸收进中国农村经济。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亟待开发的市场，政策东风吹走了覆在三农市场多年的尘土，显现的是乡村地区广袤的供给需求和涌动的经济活力。金融与电商，这两个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产业，正在新时期紧密结合、融合发展，扎根广袤的农村大地，也将成就农村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产业。作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企业都应有顺应潮流的胸怀和自我革新的勇气，从基础设施、产品服务、创新能力、思维意识等多方面实施改革，为农村电商量身打造出一套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电商蓬勃发展，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新突破点。

## 全国县域经济分化明显：约15%县市债务水平超警戒线

香港 中评网 2018年11月15日

1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暨全国百强县案例报告。报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三项标准，遴选出400强样本县(市)，构建了县域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标体系，对2018年400个县(市)的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报告指出，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呈现回升态势，但是分化却更加明显，约有15%的县(市)债务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与此同时，随着全国房地产市场转入调整阶段，部分县市将面临库存高企、风险陡增的局面。



## 县域经济总体上涨 但分化明显

报告显示,2017年县域经济平均增速较之全国更大幅度回升,400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实际增速较上年回升0.86个百分点,超过全国0.2个百分点的回升幅度。贵州样本县(市)平均经济增速仍然领先,辽宁经济平均增速由负转正但仍然垫底。

全国性县域经济研究课题组组长吕风勇表示,2017年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呈现回升态势,但是分化却更加明显,部分县域经济特别是辽宁县域经济表现令人堪忧。

区域方面,经济运行态势发生全面逆转,东部地区样本县(市)平均经济增速由降转升,中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则由升转降。

消费方面,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较上年继续回落,但西部地区样本县(市)略有回升;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辽宁样本县(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达到54.3%,在25个省份中占比最高。

投资方面,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较上年明显回升,但中西部地区样本县(市)都出现回落。

财政方面,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受“营改增”的影响,平均增速较上年有所回落,八省出现负增长,但东部地区样本县(市)平均增速反而提高。对此,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郭宏宇认为,县域的投资潜力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存在东西两极的分化,因此,县市的发展需要创新来推动。

在人均收入方面,数据显示,26县(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50,000元,浙江独占20席,其中义乌市和玉环市携手并超60,000元;各区域县(市)城乡收入差距继续趋于缩小。

## 部分县市面临房地产库存高企风险

由于县域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其更容易受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特别是人口增长的有限性或是净流出,亦决定了其即使在房地产市场火热的情况下,去库存问题也一刻不容忽视。报告认为,部分县(市)借势无节制供地推盘,导致房地产库存进一步升高,在全国房地产市场转入调整阶段后,又将面临库存高企、风险陡增的局面。

2017年,受到货币化棚改政策下沉、乡村投资开发热潮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县域城镇房地产市场库存迅速下降,房价上涨较快,房价超万元县数量迅速增加。长期看,县(市)处于城市化末端,房地产市场发展空间较小,随着开发量的再度增长及销量的进一步回落,库存或将重新回升。

报告认为,对高债务县(市)的风险监测,应当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重点;压缩债务规模,则是高债务县(市)的首要任务。在三大地区中,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债务负担最大,中部地区样本县(市)最低。分省份看,主要受其近年来大规模投资的推动,贵州样本县(市)呈现“双高”特征,即高债务率和高负债率,债务负担最重;

主要得益于广东对全省债务规模的严格管理，广东样本县(市)债务水平最低。报告还发现，综合各种衡量方法，约有15%的县(市)债务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如果考虑到无法完整统计的隐形债务以及样本选择可能存在的偏差，这一比重会更高。需重点压缩专项债务的规模，特别是明确和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源。专家指出，要实现中国乡村的振兴，从现在开始就要对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如区域均衡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县权，扭转县域相对大中城市的竞争劣势；加速城市化进程并稳步推进村落撤并；通过产权改革渐次推动宅基地自由流转等。

## 社会观察

### 中国水处理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蓝伟光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年10月2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执政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把全面治理污水、消灭黑臭水体和保障饮水安全，当作与脱贫攻坚同等重要的为民办实事项目，自上而下抓落实。

但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水处理面临三大问题：

#### 一、水质标准互不协调

目前大多数环保部门根据《水十条》的要求治水，以为污水处理后排放的水达到一级A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环保部一级A的排放标准尚不及水利部关于水源水质要求的五类水标准。

国家规定，饮用水的水源必须优于三类水。

设计标准的人当时可能以为，接纳排放水的河流与饮用水的水源地是互不相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福建的九龙江，上游污水厂处理后排放的水，会成为下游自来水厂的水源。同一个水体，上游污水处理厂如果仅以一级A为标准，必然不可能把影响人体健康的化学微污染物完全去除，而下游自来水厂又没有去除化学微污染的净水工艺，由此导致饮用水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结果必然是老百姓遭殃。

#### 二、污水处理未梢把关

水污染通常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主要包含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活污染：在居民生活中产生的污染物造成的水污染，如含磷洗衣粉的污染；二是工业污染：在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污染物造成水污染，如造纸厂、采矿场排出的有毒废水；三是农业污染：农业生产过程造成的水污染，如种植业使用农药、化肥，养殖业使用激素、抗生素等。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部门把所有的压力，都传导给辖区所在的污水处理厂，指望由其末梢把关、达标排放。实际上，目前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的工艺均无法应对复杂的进水条件。举个例子，许多非理工背景的地方官员，以为只要进水的COD（化学需氧量）、BOD（生化需氧量）符合规定，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就必然合格。但他们有所不知，许多工业园区排放到市政管网中的污水，由于碳氮比严重失调，结果污水处理厂无法处理，双方互相指责，引发许多纠纷。

### **三、饮水安全指望水厂**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对饮用水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府也把提升饮用水质、保障饮水安全列入政府的工作计划与财政预算。因此，不时会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发布公告，耗费巨资升级改造自来水厂。地方政府的本意与愿望是良好的，值得肯定。然而，实际的效果却值得商榷，因为影响自来水水质的因素跟水源水质、制水工艺、输水管网、高楼水箱等密切相关。

就水源水质而言，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或多或少都遭遇了化学微污染，传统的四步法净水工艺对此无能为力，但即使采用先进的超滤膜工艺加以提升改造，也仅仅是在改善澄清晰度与去除微生物方面卓有成效，而对于水源水质中可能含有的化学微污染束手无策。进一步地说，即使水厂出水达标，经过参差不齐的输水管网、管理欠佳的高楼水箱，到了居家住户的水龙头，自来水的的天性已经无法保障了。

针对上述三大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如下三个对策：

#### **一、统一水质净化标准**

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制定的污水处理一级A排放标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相当高的了，像厦门这样一个环境优美的海滨城市所建的污水处理厂，目前仍未达到这一要求。

新时代提出了新要求，也有了新方法。科技发展到今天，即使污染程度再严重的水，都可以净化成所需洁净程度的水。因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不要再以尚不如水源水质标准五类水的一级A，作为污水处理厂的出水考核标准。尤其是当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排河入流，可能成为下游城市的水源地时，更应该注重具体的化学微污染的剔除率，而不是用COD、BOD等指标笼统地概括。

理想的做法是把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水与水源水质的标准衔接统一，针对不同的水体，规定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是否达到五类、四类乃至三类水的标准。同时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有的放矢，不搞一刀切。比如，对于以农业灌溉为主的下游用水，不应该片面强调总氮、总磷等的去除率，因为氮、磷是植物生长的主要营养物，也是水体生态多样性的必备条件。

#### **二、源头控制减少污染**

早在2003年，我接受报章采访时，就希望能通过媒体向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工业过程应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因为污染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比如说，在化工医药原料的生产中，若能在生产过程中应用膜技术取代传统的分离纯化工艺，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生产收率，降低资源消耗。随之而来的，可以减少副产品与污染物的形成及其在环境中的排放。这一技术若能在全国各地推广应用，既有可观的经济效益，更有巨大的环境效益。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工艺的不断创新，诸如膜分离之类的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当今在中国，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应用高新技术，着眼前端控制而非末梢把关，鼓励工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实现绿色制造，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进而减缓污水处理厂的负荷与压力，如此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至于生活污染，应通过科普水知识、唤醒水意识、制定水政策等方法，鼓励节约用水与循环用水，如此可减少大量污水的产生。而农业污染则有赖于国家统筹考虑，比如应杜绝生产高毒低效、半衰期长的化学农药，鼓励、补贴农民使用高效低毒、易降解的生物农药。同时，在广大农村乡镇地区，应当避免大城市大建管网、收集污水、统一处理的做法，而是采取因地制宜、截污减排、分散治理、就地排放的做法，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污水处理而不是建设管网。

### 三、终端保障饮水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饮水安全面对千家万户、事关千秋万代。因此不管如何强调饮水安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都不为过。

然而，当今中国，饮水安全面临的危机却非常严峻。究其原因，乃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排入水体中的污染物，已经远远超过了环境所能接纳与自净的容量。

结果是，无论东西南北，江河湖库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早年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够以及对污染危害的认知局限，导致一些半衰期长、难以分解的化学微污染排入水体，因此水源水质令人担忧。而自来水的净水工艺，如前所述，即使采用先进的超滤膜工艺对此亦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中国大多数城市的自来水厂所生产的水，绝大部分都是用于工商业、建筑业等生产环节，用于城镇居民生活饮用的部分所占比例不大，再加上输水管网、高楼水箱等二次污染等因素，从源头升级改造自来水厂实质上没有必要。如此做法，即使耗费大量政府资金，仍然无法保障民众的饮水安全。

我的建议是通过终端净水、末梢把关的方式来确保公众的饮水安全。当然，选择终端净水方法时必须确保节水优先，选择节能减排的技术与产品。笔者获悉中国最近制定标准，要求终端反渗透纯水机的回收率必须达到35%以上。中国政府以此作为标



准，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反渗透纯水机，仍然达不到这一要求。问题是，即使达到这一标准，仍然有65%的自来水被白白浪费，不符合习近平提出“节水优先”的治水方略。

鉴此，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跟踪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采用新兴技术，替代传统方法，提高净水回收率。举例而言，某科技公司已经开发出了最新一代的纳米过滤与净化技术与产品，所用的先进材料制备技术，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纳滤芯产品的制备技术已荣获厦门市专利特等奖与中国专利优秀奖，基于纳滤芯技术开发的终端净水装置，已经荣获国家科学技术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颁发的重点新产品证书。该产品的净水回收率达到100%，不用电、无废水，而且可以在保留水中天然矿物质的同时去除化学微污染，值得大力推广应用。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系兼职教授、新加坡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促进协会常务副会长。当今中国，饮水安全面临的危机非常严峻。究其原因，乃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排入水体中的污染物已经远远超过了环境所能接纳与自净的容量。结果是，无论东西南北，江河湖库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 “互联网+”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香港文汇报 2018年12月14日

近日，2018中国“互联网+”峰会在北京召开。“互联网+”的概念再次走红并得到新的重视。回顾我国“互联网+”的发展，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其内涵是创新2.0下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主要突出在利用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将互联网与我们熟悉的传统行业进行融合和再创造，从而提高传统行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促进市场升级，有效打通各经济行业的壁垒，形成更加广泛、更加开放的经济发展的新形态。

### “互联网+”发展现状

经过过去几年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实现了由理念到行动，由探索到实践的长足进步，整个社会对“互联网+”的认识水平不断加深，相关的基础建设不断被夯实，可以利用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出来。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需要清楚的认识，这种短期的发展并不全面和充分，在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类型接轨和融合的过程中存在不深入、不均衡的问题。整体上存在着短板，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具体而言，仅消费互联网中的电商等相对初级的行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在“互联网+”的参与下，传统消费行业得到了有效的改造，对商品生产、市场流通、经营销售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消费互联网中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诸多方面，仍然需要大力推进。“互联网+工业”仍然面临着一定技术难度和信息壁垒。“互联网+金融”由于缺少有效的风控和合规措施和面临的监管困境，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 “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下一步，推动“互联网+”的举措应当集中于两个方向。第一、从广度上讲，在与行业结合的过程中，应与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举措紧密结合，通过“互联网+”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效率，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实现创新驱动；

第二、从深度上讲，将新技术、新方法 with 互联网平台融合，拓展“互联网+”的深度。

### “互联网+”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互联网+”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密结合，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加速转型，打破传统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的边界，重构企业的生产、服务流程，在传统行业内部发掘新的商业模式。

如在建筑行业中，通过“互联网+”，将日常管理信息数据化，实现行业上下游信息的互联互通，通过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促进行业的多维度合作。

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中，互联网提升了传统金融行业的运作效率，但只将线下的产品和服务搬到了线上，放大了金融属性，在缺失有效风控的情况下，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

而如何做好去金融化，将互联网金融技术化，并深度挖掘与外部行业的可结合性才会使互联网金融进入新的发展时代。

### 新技术下的“互联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计算等新一代技术革命和创新，将新技术与“互联网+”有效融合，提升平台应用水平，加强平台基础建设，使平台更加智能化，将有助于扩大“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实现创新飞跃，促进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 综合治理

### 政治局集体学习“吏治” 中共披露这些“用人”新动向

美国《侨报》2018年11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26日召开会议，并围绕“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主题进行了集体学习。所谓“吏治”，即旧时指中国地方官吏的作风和治绩。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此次会议强调用人观，也透露出目前中共选人用人的一些新动向。

## 十九大后首次开展“用人”学习

据新华社26日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当天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此次集体学习是中共十九大后，政治局首次针对“用人”开展学习。《侨报》记者梳理发现，从去年10月底至今年10月的政治局九次学习，主要聚焦人工智能、乡村振兴、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大数据战略及《共产党宣言》等主题。

为何安排这一主题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目的是了解中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借鉴。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但他也强调，中国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必须注意的。

### 政治品德要过硬 注重选拔“专才”

关于如何吸取历史经验、选好人用好人，习近平提到了5个要：要严把德才标准，要坚持公正用人，要拓宽用人视野，要激发干部积极性，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这其中有许多表述值得关注。比如，“德才兼备，方堪重任”，且以德为先；而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硬。

另外一些提法也较罕见。习近平提到要“拓宽用人视野，打开视野、不拘一格”。要多选一些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官员，要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官员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

除此之外，现在的官员任用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从近期的人事调整可观察到，不少专业性强、学者型官员被予重任，比如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的童道驰，这位官员长期在中国证监会任职，之后空降湖北担任两年副省长之后，在今年10月跻身海南省委常委。

### “文山会海”助长官僚主义

目前官员队伍面临的矛盾问题也在此次学习中被点出。

习近平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 保护知识产权重在惩戒制度

新浪网（香港）2018年12月6日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加大关乎国家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其中关键是对失信、侵权主体惩戒措施的完善。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38个部门联合签署《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将跨部门联合惩戒包括重复专利侵权行为、不依法执行行为等在内的六大类行为将被认定为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相关的严重失信情况不仅将记入征信系统，严重失信主体还将面临申请发行企业债券不予受理；限制设立金融机构；限制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等共计33项联合惩戒措施。

无独有偶，差不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后者明确了知识产权法庭的机构性质、受案范围、诉讼程式、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程式衔接等内容。意味着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再现重大进展，知识产权法院细节正成形。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和营商环境都是重要条件，二者的核心要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事实上，保护知识产权一直颇受重视。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是创新原动力的基本保障，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只不过最近多部门的联合惩戒备忘录和知识产权法院逐渐成形，将重点落在完善惩戒制度上。

的确，一直以来国内失信、侵权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侵权方违法成本低、被侵权方获得补偿低的“双低”问题。

目前来看，知识产权案件的侵权赔偿标准有三种：一是实际损失标准，即侵权人按照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二是违法所得标准，即在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情况下，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三是法定赔偿标准，即在实际损失和违法所得都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进行酌定。

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实际损失和违法所得都较难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绝大部分侵权案件最终采用了法定赔偿标准确定侵权赔偿数额，这就造成了“双低”的问题。

近年来，不管是“双低”还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都体现国家对创新日益重视。但创新是九死一生的事，企业千辛万苦搞创新，是因为预期创新可以带来更丰厚的回报，可以让自己成为市场上的大赢家。



然而，现实却常常将创新者拖入尴尬境地，新产品新工艺还没能为自己创造价值，就被山寨被窃取，市场上忽然钻出大量仿冒品，而且价格低得惊人。最后反倒是创新者不敌山寨，甚而被挤出市场。数据显示，近几年全国知识产权案件受理量保持20%以上的增长，不过随着打击力度加大以及惩戒制度的日益完善，再审率和改判发回重审率则双双下降。

国家的科技创新，有赖于强有力制度保障。可以想见，随着联合惩戒措施的落地，以及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侵权、失信主体将为其违法违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将实质性提升。

## 环境观察

### 让世界自贸区评价标准融入中国元素

香港《亚洲时报》2018年11月25日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5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推广至全国，形成了改革红利共享、开放成果普惠的局面，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作用。

作为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开拓性尝试。自贸区卓越指数指标体系的编制，是对上海自贸试验区五年的建设成果进行全面评价，与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进行逐一对标，谋求全球自贸区评估话语权的重要举措。

#### 未来自贸区计划

当前世界上在自由贸易区领域的国际组织主要有3家，即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World Free Zone Convention），世界自由贸易区联合会（The World 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Zones），世界自由贸易区组织（World Free Zones Organization）。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世界自由贸易区组织。该组织于2014年5月在日内瓦注册成立，总部位于阿联酋迪拜。该组织的目标是：集结全球主要自由贸易区；集结区域性、国际性、地方性自由贸易区组织；集结自由贸易区用户；集结相关的政府机构和国际贸易机构，以交换知识、开展教育培训、交流和开拓业务，为全球自由贸易区提供一个学习、成长、发展的公共平台。

2016年5月，世界自由贸易区组织在迪拜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推出了“未来自贸区计划”（Introducing the Free Zone of the Future:A Global Initiative for Local Prosperity）国际动议。“未来自贸区计划”包括“卓越性和最佳实践”、

“创新创业”、“可持续性”等核心支柱，旨在引领全球自由贸易区卓越发展，并希望以此为框架构建一套引领性、适用性的国际评估体系。

### **自贸区卓越指数指标体系**

2017年11月，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与世界自由贸易区组织就共同开展自贸区标准制定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2018年3月17日，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支持下，中国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在上海正式发布自贸区卓越指数指标体系。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支持下，中国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暨上海财经大学以“未来自贸区计划”的三大支柱为理念，并参考借鉴国际权威的与投资、贸易、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17个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了自由贸易区卓越指数指标体系框架及一级、二级指标和可比较、量化的指标度量。

自由贸易区卓越指数指标体系框架由4个维度构成，即营商便利维度、经济贡献维度、创新创业维度、可持续性维度。营商便利维度衡量自贸区投资贸易便利化，旨在反映自贸区运行的“自由化”制度环境；经济贡献维度衡量自贸区对地区的经济贡献，旨在反映自贸区的经济效果；创新维度衡量自贸区促进知识和技术创新及中小企业发展的绩效；可持续性维度衡量自贸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绩效。这4个维度既具有国际普适性，又符合自贸区未来发展和追求卓越的基本导向，具有很好的引领性和国际可比性。

2018年4月，世界自由贸易区组织在迪拜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年会和展会上发布了“未来自贸区计划”评估指标体系，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的推介下，该体系的第四个维度“卓越商业和经济贡献”（Business Excellence & Economic Contribution）引入了“自贸区卓越指数”的营商便利维度和经济贡献维度。

### **提升话语权**

可以说，自贸区卓越指数指标体系符合世界自贸区未来发展和追求卓越的基本导向，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及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符合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要求。根据自贸区卓越指数指标体系创新编制上海自贸区卓越指数，是上海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新时代坐标中追求卓越发展取向，努力把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引领全国自贸试验区发展的标杆，发展成为全球开放水平最高自贸区的重要举措。

通过自贸区卓越指数指标体系建设及上海自贸区卓越指数编制，中国可积极参与引领世界自贸区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在世界自贸区评价和引领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既有利于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对标最高国际标准，建设一流营商环境，通过全面复制推广，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又可使世界自贸区的评价标准融入中国元

素，更具普适性。

更重要的是，通过积极参与引领世界自贸区评价标准制定，展现了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的决心。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我们无法回到旧的多边主义。我们没有一个单独的指挥。现在正在演奏的乐队变多了。我们需要新的协调。一个新的合作型秩序对于实现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最根本目标至关重要：让各国得以实现更强劲、更具包容性和更可持续的增长，避免金融危机，解决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不容忽视的全球挑战。

实施正确的国内政策是构筑共同繁荣的核心。在技术进步和贸易中总是会出现赢家和输家。但太长时间以来，太多国家的国内政策一直未能消除这些隔阂。它们现在可能会破坏对开放的全球秩序的支持。最根本的是，随着数字经济和机器学习加速，我们需要改革教育并投资于终身学习以确保就业充足、而不是失业的未来。

然而，国际倡议能够也必须支持国内举措，为全人类创造更强大的未来。首先，我们必须推动国家之间互相促进的政策。支持创新、投资和金融稳定的国内政策在国际范围内普遍施行时最为有效。同样，要避免对一国有利、损害他国利益的“以邻为壑”政策，国际承诺仍然必要。但在当今相互联系极其密切的金融市场，即便是旨在实现国内目标的政策也可能产生巨大的国际溢出效应，这将限制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要减少这种溢出效应及其影响，需要建立一个框架。

其次，我们必须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独特能力来促进发展。目前这些促进作用还留有很大空间，特别是支持各国努力加强治理能力，以及开发人力资本（无论性别、民族和社会地位）的全部潜力。

第三，要避免大规模金融危机，发展合作能力，以遏制日益加剧的环境脆弱性以及传染性疾病的威胁（如果不解决，将使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和被迫移民），国际协调必不可少。

国际合作与保持增长和稳定的国内战略之间不是二选一的问题。一个开放、竞争、协调良好的国际秩序将改善所有国家的前景。它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所有国家，因为假以时日，增长以及新就业机会将受到侵蚀，金融危机将再次发生，全球共同利益将变得更为脆弱。

我们与G20全球金融治理专家团的同僚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帮助国际社会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并完成向新的合作型国际秩序的重要过渡。我们不需要新的超国家组织。新的多边主义要求我们采取大胆且明确的措施，确保现有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越来越重要的区域和双边参与者）作为一个体系共同合作，

实现对发展的更有力且更持久的影响。我们必须避免未来出现“巴尔干式”的金融。

在采取联合行动缓解国内风险、在整个系统中分散风险方面，尚有巨大的未开发潜力。这种联合行动的方式能够释放未来需要的更大规模的私人投资，包括将吸引机构投资者新的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方法。

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是对未来10年的空前挑战毫无危机意识。在发展中世界，与过去任何一个10年相比，未来10年将会有更多的人达到工作年龄。全球所有地区都需要旨在加强治理、最大化实现技术和市场的潜力以及创造就业的改革。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非洲获胜，在那里，贫困、人口统计状况和环境挑战最为严重——贡献力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机会也最大。失败的后果不会只是在经济方面。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以避免另一场大规模金融危机，并帮助各国消除当今银行业体系反复出现的不稳定、实现增长。我们需要更为强大的国内金融市场。但我们还必须让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在亟需的时候为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融资，同时避免使增长受挫的阵阵波动。同样，我们需要一个强大且可靠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络以保证市场开放。过去10年，多层次的全球、区域和双边金融安排一直在发展。但各个地区的发展极不均衡，其有些主要组成部分尚未在危机中得到测试，而且缺乏协调。

其中很多改革的政策思考通常由所在位置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集体决议，由所有国家都有既得利益的更广大目标决定：为这个与70年前设立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机构时已大有不同的时代，创建一个合作型国际秩序，这样我们就能让世界为增长保持开放。

## 中美贸易“休战”的意义

周慧来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年12月12日

在二十国集团(G20)阿根廷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了为期90天的“休战”共识。鉴于一年来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强大外溢性，这次中美贸易“休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两国有一个时间窗口来解决各自所关切的问题，其更大的意义是表明两国都有不让双边关系走向崩溃的意愿，从而阻止两国关系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实力增长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产生的。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之间开始形成国际政治上经典的“老大”与“老二”的关系格局。

2017年，中国GDP总量与七年前相比翻了一番，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被认为是中



美关系发生质变的一个临界点。伴随着实力的此消彼长，中美两国竞争的层次、类型、密度和空间范围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于是，中美两国能否跨过“修昔底德陷阱”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2017年1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并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进入2018年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3月份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并得到了总统特朗普的签署，4月份美国商务部宣布制裁中兴，7月份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

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被视为中美建交以来，美国领导人对华最为负面和强硬的宣示。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开始推行印太战略，军舰多次闯入南中国海。一时之间，中美之间即将爆发新冷战的猜测不脛而走。

虽然中国外交自中共十八大后由原来的“韬光养晦”转向为“有所作为”，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致力于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最高领导人多次提出与美国一起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明确表明不谋求颠覆现行世界体系，不谋求挑战美国霸权地位。

同时，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与美国关系搞坏没有任何好处，完全不利于中国到21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肯定不会主动挑起与美国的新冷战。

因此，美国掌握着是否与中国来一场新冷战的钥匙。但只要稍微理性一点分析就可以知道，与中国展开全面对抗，同样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其一，中美同处在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美国即使要与中国全面脱钩（且不说能不能做到），但做不到让盟友也同样如此。全球化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像以往那样，对世界经济政治进行掌控和主导。如果没有盟友的跟进配合，美国要对中国发动当年类似于对苏联那样的冷战，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二，较之于对抗，一个合作的中国更能够符合和实现美国的利益需求。虽然在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世界秩序正在转型之中，世界体系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固然不会轻易让渡权力，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国家利益的拓展，自然有获取更多权力的需求。

但一旦两国相互否决性的权力博弈，导致世界体系的崩溃与解体，对中美双方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是灾难。相反，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两国在改革世界体系和全球治理上，完全可以发挥互补性的智慧，顾及对方正当权益，实现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

其三，如果摒弃了理想主义情结，美国的对华政策会更加理性，也更符合自身利

益。中国有着近五千年的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未曾中断，可美国人却始终有一种近乎于宗教般的热情，引导和期待中国发生符合美国标准的改变，这无疑是一厢情愿。美国固然需要警惕和防范来自中国的挑战，同时也必须放弃“要么跟我一样，要么就是我的敌人”这种非白即黑的二元思维。

其实，自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以来，中国虽然没有发生美国所期待的政治改变，但毕竟逐步接受了世界主流价值，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自由贸易理念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只不过还在不断探索实现这些价值的方式和路径。

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和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相比，今日中美关系要远为复杂。巨量的贸易规模说明，一方面经贸摩擦将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只要能够有效管控分歧，经济贸易在两国关系当中的压舱石效应仍将存在。

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的博弈与合作空间同时存在，更何况作为两个拥核大国，双方必然会顾及对方划定的红线。所以，中美之间既需要有维护稳定关系的战略，也需要一些更细微的政策来解决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以战略原则为指导方向，以具体政策为手段，只有两方面结合，中美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12月1日，中国华为孟晚舟事件发生，国际社会担心中美两国解决贸易争端再生变数。12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声明，对中美未来90天达成经贸协议充满信心。美国总统特朗普于7日在推特上转发了这个声明并予以认同。中美贸易战已有时日，双方各有所伤，也都累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从这个角度讲，世人对中美两国元首在G20阿根廷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应该抱有信心，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也不必悲观。鉴于一年来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强大外溢性，这次中美贸易“休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两国有一个时间窗口来解决各自关切的问题，其更大的意义是表明两国都有不让双边关系走向崩溃的意愿，从而阻止两国关系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 学术前沿

### 专家热议G20

12月1日，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南美洲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落下帷幕。峰会通过了《G20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世贸组织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达成共识，表达了G20成员领导人将继续推动强劲、持续、平衡的世界经济增长的政治意愿。本栏目收集整理了各大专家、学者的言论，仅供参考。

**G20峰会中方表态有重要意义** 美国国务院顾问地缘政治专家约翰·锡蒂兹：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应该坚持开放导向，秉持自由贸易理念，保持和扩大市场开放，在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中实现合作共赢，这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十分关

键。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上的演讲，为世界经济把握正确方向再次提供了中国思路。他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只有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才能合作共赢。（央视网 2018年12月4日）

**G20峰会向世界释放多重积极信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此次G20峰会围绕“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主题，达成一系列共识，形成诸多务实成果。一是沟通贸易和投资体系改革议题，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全球贸易秩序。G20成员领导人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二是探讨数字经济合作的政策方案，塑造未来世界经济创新和包容性发展议程。今年，峰会延续了最近三年关于数字经济和创新相关议题的讨论，并加大了关注，将其嵌入到金融、就业、教育等各个议题的讨论中，以确保新科技和新经济的红利可以普惠共享，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数字鸿沟扩大，以及发展不平衡加剧等挑战。三是推进全球基础设施融资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平衡发展。今年G20峰会进一步探讨如何促进基础设施融资的差异化监管、项目准备、基础设施资产的证券化等具体议题，以更有效地动员其他力量参与基础设施融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四是继续加强全球金融系统建设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世界经济风险。基于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全球债务风险攀升的警告，G20峰会呼吁各国更灵活地运用财政政策，推进结构性改革和政策协调。今年G20峰会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加强对低收入国家债务监测和能力建设，并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探讨加密资产风险监管。（新华网 2018年12月4日）

**G20峰会将促进全球治理关注人的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胡键**：G20峰会涉及国际贸易体系的存废之争。全球治理转型才刚刚开始，此前的“转型说”似乎都背离客观实际的判断。但是，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出现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转型的迹象。中美贸易摩擦究竟走向何处？这实际上不是一个纯粹的贸易问题，而是关乎现存国际贸易体系存废的问题。当然，美国难以掌控G20峰会来打压中国，相反，美国在历经8个多月的试探之后将在这次峰会上在某些方面做出某些妥协，以缓和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矛盾。根本次峰会将首先关注人的需求问题，让发展惠及所有人。因此，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建议峰会三项中心主题为：未来就业、为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人类食品未来。这三项议题全都是涉及人的发展的问题。全球治理关注人的问题使全球治理的议题更加接地气，更加切合人的现实的需求，而不会在空洞的概念争议中陷入无序状态。长期来关于全球治理的空泛概念的争论使得全球治理实际上是全球无法治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本次G20峰会的议题因具体而更加有价值。（学术沙龙 2018年11月29日）

**G20面临成立以来的最严峻考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孙海潮**：欧盟舆论指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祸根是美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经济和欧元地位造成重大打击，对美国自然是重大利好。另外，美国通过一系列战争以及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使欧洲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中东北非难民对欧洲社会造成严重冲击，欧盟民粹主义和社会极化加剧。美国通过一系列举措打击欧洲建设。欧盟经济至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水平在美欧经济同时陷入衰退之际，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35%，新兴经济体强势崛起，成为世界的另一道风景。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并非只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全世界。欧美传统盟友关系受到的冲击并不弱于中美关系。特朗普因拒绝签署最后声明而使G7峰会“归于失败”。从本届APEC峰会传递的信息来看，美国以邻为壑做法短期内难以改变。G20作为世界上最大和作用最显的经济和金融机制，面临成立以来的最严峻考验。（新浪网 2018年10月23日）

**管控竞争、寻求合作，化解中美“弱对抗”** 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杨文静**：美国如上政策使中美关系呈现一种“弱对抗”状态。从今年3月开始，中美贸易冲突始终难以化解，两国高层沟通一度停滞。而与此同时，中美在朝核上合作并不顺利，加上美国加大对台海、南海干涉力度。但正如历史所证明，在中美关系的紧要关头，两国均不愿发生冲突或战争，不愿危险失控，而11月中美政治与安全对话的恢复以及就危机规避与管控达成谈判协议，表明防止冲突与对抗仍是两国的最大公约数。此外，两国在朝核、阿富汗等地区问题上仍有较大合作空间，可作为未来稳定关系的有力助推器。在经济层面，尽管曾经的压舱石成为今天的麻烦之源，双方的博弈依然激烈。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范式转换”已然来临，需要各方妥善应对，才能防止双方由“弱对抗”滑向“强对峙”。（香港凤凰网 2018年10月23日）

## 《电子商务法》解读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电子商务法》，标志着电商行业进入到“有专法可依”的时代。当电子商务高度融入我们生活、经营日常的时候，这部新法注定与广大消费者、经营者、监管者等密切相关。那么，这部将于2019年1月1日生效的《电子商务法》，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本期，我们搜集整理了多位专家、学者对《电子商务法》的解读，整理成文，供领导参考。

**出台《电子商务法》的意义**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电子商务法》出台有三方面重大意义。首先，使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有法可依，明确了国



家要促进和鼓励电子商务发展的基调。其次，使电子商务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一步在法律层面得到了明确，是公平竞争的关系，促进了线上线下的公平竞争。最后，对当前社会关注的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在法律层面给予了明确。其中包括销售假冒伪劣、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这些问题，在法律层面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9月6日）

**电商法纳税意义及纳税后的影响**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董毅智**：本次将税收问题纳入《电商法》范畴既是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一个强调，也是电商法规范范围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我国将税收制度逐渐收紧的信号。由于近年来电商发展快速，偷税漏税的情况较为突出，因此借着电商法的出台将税收制度纳入其中，这是行业发展的进步。

纳入税收之后，可能对平台上的经营者产生打击。平台内的经营者既然进行了经营活动，缴纳税款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由于监管上和制度上的薄弱，所以经营者已经习惯了不缴纳税款的情况。本次电商法并没有为电商平台内经营者单独设立税种的迹象，相反，其明确了作为经营者不区分线上、线下、传统与电商，只要生产经营满足收税要求就应当缴纳税款。从监管角度，偷税漏税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的原因不在于法律的缺位，而是在执行与落实，这就与征税成本相关了。（大姚县政府网 2018年12月4日）

**电商平台的责任承担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田静婷**：目前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渗透广、变化快，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此次《电子商务法》把调整范围严格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限定在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因此对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对利用信息网络提供的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方面的内容服务都不在这个法律的调整范围内。在推进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法律对于促进发展、鼓励创新做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规定。实践证明，在电子商务有关三方主体中，最弱势的是消费者，其次是电商经营者，最强势的是平台经营者，所以《电子商务法》在均衡地保障电子商务这三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加重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特别是第三方平台的责任义务，同时加强了对电子商务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三秦都市报》2018年9月21日）

**强化经营者举证责任，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 在消费维权过程中，消费者经常遇到举证难的情况。特别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有关合同、交易记录等证据大多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拥有。发生消费纠纷时，消费者如事前未做证据留存，往往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一些电子商务经营者甚至伪造、篡改、销毁、隐匿相关证据，使消费者维权更加困难。《电子

商务法》对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都提出了提供相关证据的义务，如原始合同、交易记录等，并规定丢失、伪造、篡改、销毁、隐匿或者拒绝提供前述资料，由电子商务经营者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这一规定有助于改变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便于有关司法机关等查明事实，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中国消费者报》2018年9月25日）

**微商等电商形态被纳入监管** 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昌**：《电子商务法》对于电商形式的规定采用了排除法，即只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本法”，其他的只要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都属于“本法所称电子商务”，都要受《电子商务法》的管理。明确了微商和其他电商形式是一样，并不因为所依托的是社交平台而有特殊待遇，微信运营方也要依法对微商进行相应管理。这一规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为将来新的电商形式留出了空间，未来可能会出现各种新的电商形态，如果《电子商务法》对“电商”规定过死，就难以适应新出现的电商形态。现在对电商的定义只做了一个原则性规定，只排除了几种产品和服务，这有利于《电子商务法》不断适应新出现的电商形态。（《中国消费者报》2018年9月6日）

**海淘不再是法外之地**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董毅智**：长期以来，跨境电商存在两种业务模式：保税和直邮。由于法律关系不明确，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关系导致的责任也不同，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纠纷。此外，跨境交易还存在逃税避税、涉嫌走私问题；部分跨境经销商真假掺卖、不提供售后；私下交易、现金交易以逃避监管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因此第二十六条明确了跨境电商无论何种模式，必须遵守进出口以及国内法律。

举个例子，今年7月，英国多名婴儿饮用爱他美奶粉后出现呕吐症状，当时相关部门称这款奶粉未通过一般贸易和跨境电商渠道进口到中国，即未有报关产品。但如果采取直邮、微商代购等模式进口这款奶粉，就可能处在监管空隙。在《电子商务法》实施后，直邮模式纳入跨境电商范畴，也就意味着其也需要满足报关程序以及国内对奶粉的规定。

总的来说，《电子商务法》出台后将对于现状发生较大的变化，许多原本的“法外之地”被纳入监管范围内。（《中国消费者报》2018年9月6日）

**电商经营者需登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研究员**周汉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薛军**：作为电子商务法的实施细则，近期公布的《关于做好电子商务

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则采用了更符合电商发展实际的思路：允许其将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也就是承认了网店登记地址作为经营场所。

经营场所的界定，过去对于电商来说一直是痛点，也是过去平台经营者推行市场登记的一大难点。在电商时代，网店地址就是一个有效合法的经营场所，因此把它作为一个登记经营场所，反映了电子商务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个符合电子商务发展的制度创新。

《电子商务法》规定了可以免除登记的四种情形，分别为：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华夏时报》2018年12月11日）

## 信息快递

**共享经济寒冬已至**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11月16日报道，截止2017年6月，摩拜与ofo的日订单量均超过2000万，损毁率不低于20%，而第二梯队倒闭趋势显现，用户押金退还不了的情况比比皆是。2017年7月，共享单车首例破产案小鸣单车在广东通报，公司账户仅余35万元，无力偿还金额高达5540多万元的债务。不只是共享单车，共享经济在其他领域也风波不断。互联网金融行业曾经的引领者，以链接金融需求为目的的网贷平台年内频繁暴雷，多家百亿级交易资金的平台跑路。种种乱象一方面可以归结于当前社会并没有建立起适合共享经济的秩序，受到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制约，共享的生态还不成熟。从目前的情形出发，共享经济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过剩资源的副作用，监督不力的巨大隐患，共享概念的偏差都是行业发展巨大的制约因素。共享生态的形成，需要的是多方协作，共促共享经济繁荣发展。

**中国经济不能失去结构调整的机会**香港中评社11月28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是短期和中长期、国内结构性矛盾和外部冲击相互交织在一起，当前的经济政策必须两者兼顾，但调结构才是主要矛盾，中国不能失去这次结构调整的机会。高培勇认为，一方面要关注结构问题，这是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要兼顾目前短期需求所受到的外部冲击，特别是外部需求受到的外部冲击。但不能平均使力，50%力量对付需求，50%力量对付供给，50%力量搞总量调节，50%力量进行结构调节，这也不行。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分清主次。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用告诉增长阶段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解决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

**改革开放是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香港《文汇报》11月22日报道，中国的改

革，从解决思想路线开始，一方面实事求是、一方面解放思想，然后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时候就开始实施制度变迁。从农村来看，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城市来看，就是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让它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运行当中最活跃的细胞。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当改革在逐步深化的时候，也进行了开放。中国打开了大门，欢迎全世界的资本进入到中国。“大量的外国资本进入到中国，他们和中国的比较优势相结合，整个中国经济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对市场认识不断升华以及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一个进程。中国最开始是计划经济，80年代初是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后来发展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再往下发展就是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又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新一轮农地改革政策加速制定** 香港财华网11月29日报道，目前从有关部委及权威人士处获悉，包括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在内的三块地改革试点即将收官，近期还将重点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照计划，土地确权登记及三块地改革试点均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接下来将进行农村土地改革三项试点总结评估期，在此基础上加快土地管理法修改。此外，新一轮农地改革政策正在加紧制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政策制定工作已启动，不久后将出台。还将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身份确认，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红利将加快释放。

**证监会将推股权众筹** 《香港商报》12月3日报道，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局局长李至斌1日透露，目前中证监正在制定完善《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准备先行开展股权众筹的试点，建立小额投融资的制度。李至斌指出，目前受到《证券法》与《股票公开发行核准》的限制，真正的股权众筹融资在国内还没有开展，仍在运营的互联网平台实际上从事的是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互联网较发达地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通常也有最低的投资门槛限制，并且单个项目的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200人，通过专项整治各地有效出清了风险机构和平台，该领域总体风险可控。李至斌指出，《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旨在缓解小微初创企业的融资难题，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将充分吸取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经验教训，在履行相关程序后，稳步推进。



**内地打击原料药垄断涨价** 香港《文汇报》12月7日报道，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根据对中国三家冰醋酸原料药生产企业的反垄断案件调查，依法对三家涉案企业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共计1,283.38万元（人民币，下同，约合港币1,454.07万元）。这是反垄断法实施10年来，中国在原料药领域反垄断案件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作为原料药，冰醋酸主要用于血液透析浓缩液的生产。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滥用行为调查处处长刘健说，从三家涉案企业的垄断行为来看，一是严重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三家涉案企业是中国市场上仅有的三家冰醋酸生产企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后，统一了冰醋酸原料药价格；二是加重了下游制药企业负担。冰醋酸是血液透析浓缩液的主要原料药，价格大幅上涨直接增加下游生产成本；三是危害透析患者正常治疗。刘健介绍，接受反垄断调查后，三家企业已将冰醋酸原料药销售价格恢复至竞争状态，并保障市场正常供应。他表示，当前中国原料药领域垄断行为时有发生，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原料药领域反垄断执法。

**中国建成世界最大社保体系** 香港《大公报》12月13日报道，国务院新闻办12日发表《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白皮书显示，40年来，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拉动世界社保覆盖率提高11个百分点。同时，老人权益保障机制也得到逐步健全。截至2018年6月，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25亿、1.91亿、2.3亿，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超过13亿；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1.5亿人，覆盖全国82.81%人口。白皮书称，自2005年起，连续14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240元（人民币，下同）提高到2018年的490元。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不断提高社会保障领域公共服务能力。2016年，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正式上线，实现跨省异地就医持社会保障卡即时结算。

**中国石漠化扩展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香港新闻网12月13日报道，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13日表示，第三次石漠化监测结果显示，中国石漠化扩展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呈现面积持续减少、危害不断减轻、生态状况稳步好转的态势。监测结果显示，人工造林种草和林草植被保护对石漠化逆转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贡献率达65.5%；因人口压力减轻和农村能源结构调整促进植被自然修复的贡献率为24.4%；农业技术措施的贡献率为3.9%；其他因素的贡献率为6.2%。

刘东生表示，虽然石漠化防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已经初步治理的地区，植被刚刚开始恢复，必须加强保护，否则极易反弹；现有的1,007万

公顷石漠化土地，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岩溶地区尚有近 200 个贫困县，有 261.6 万公顷石漠化耕地仍在耕种。下一步，要以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促进绿色增长、助力群众增收为目标，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依靠科技，依靠改革，创新思路，强化措施，加大石漠化防治力度，提升治理成效。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不明显** 美国 侨报网 12 月 14 日报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4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毛盛勇表示，从前 11 个月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来看，主要指标运行比较平稳，增长、就业、物价和效益指标整体表现是不错，甚至好于预期。毛盛勇称，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数据来看。增长，从目前来看，经济平稳运行的态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价格，特别是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受去年翘尾减弱的影响，PPI 有所回落，价格总体来讲在合理水平；就业目前看也还是比较平稳。由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包括世界贸易增长的步伐有所放缓，这对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可避免地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如果说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直接可能是对进出口带来影响，但现在影响并不大。

**中央正研究海南自贸港政策** 《香港商报》12 月 15 日报道，海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介绍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有关情况时表示，中央有关方面正研究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毛超峰表示，对于自由贸易港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建设问题，中央有关方面和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围绕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进行研究。海南正配合有关部门做基础性工作。海南方面目前的进展，毛超峰称，一是建立了高层的领导机制，中央成立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也建立了中央统筹、部门支持、省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二是已经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目前海南正按照《总体方案》要加快推进海南自贸区的建设。三是目前加快国内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创新的、出台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落地。四是在这个基础上，要结合海南“三区一中心”定位，进行海南独具特色的创新。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何楚龙

地址：城站路 85 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